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成立已经五十年了。

五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转瞬之间，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是个不短的历史旅程。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难曲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的国家里，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着促进中国民主政治早日实现而诞生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有幸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走过了五十年光辉的历程。

从 1945 年 12 月 30 日成立的那天起，中国民主促进会就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有组织有领导地带领自己的成员并团结广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以有特点的斗争方式，积极投身反对内战、要求和平 反对独裁、要求民主 反对卖国、要求统一的爱国民主运动 在

中国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斗争实践中，民进深受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的影响，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了自己正确的历史选择，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民进密切联系教育、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团结和带领广大会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为人民革命事业作贡献，同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情愫，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合作，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并形成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传统。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我国的一个参政党，正在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同时继续发挥组织整体功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带领全会同志团结奋斗，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五十年之际，回顾和审视走过的历史足迹，并在新的起点上展望未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第一章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抗战结束后，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建国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八年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饱受战争煎熬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使大家得以休养生息，致力生产建设，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即公开发表了《对于目前局势的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 保证国内和平 实现民主 改善民生 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 实现全国的统一 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完整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①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能继续封建法西斯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053 页注（2）。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第一版。

的独裁统治，公然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顽固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方针。1945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就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叫嚣：“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①，并在其决议中恶毒攻击和诬蔑共产党“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为其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张目。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两种建国方针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同时也为了在舆论上欺骗广大群众，玩弄起和谈阴谋，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中共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维护国共合作，尽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同时也为帮助广大群众认清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真实面目，8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重庆谈判是一场严肃尖锐的政治斗争。事实上，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更无准备，对谈判提不出任何具体建议。中国共产党从尽量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实现国共再度合作、共建新中国的良好愿望出发，在坚持必须承认共产党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及保留一定数量人民军队等原则的前提下，对国民党及其政府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表现了对谈判的极大诚意。但蒋介石集团拒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企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借口下，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43天的较量，10月10日蒋介石

被迫与中共代表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国共两党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接受实行民主政治、党派平等、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原则,并承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其他各项重要问题。重庆谈判取得了有益的成果。

但是,蒋介石集团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始终没有改变。就在谈判期间,他依靠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将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的大批国民党军队运送到解放区周围,作好了包围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并在山西、山东、广东等地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起挑衅。10月13日,《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撕下伪装,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出内战密令,开始对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

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肇始大规模内战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国人民建设和平民主新生活的愿望,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进犯的同时,一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兴起。11月19日,重庆各党派、各界群众成立反内战联合会,号召人民以实际行动反对美蒋内战政策。25日,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次日全市三万学生一致罢课,抗议军政当局的暴行。12月1日,昆明军政当局出动军队和武装特务血腥镇压学生运动,造成了打死四人、炸伤殴伤数十人的“一二·一惨案”。血的事实,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真面目,教育了广大群众,也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全面高涨。

第二节 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抗战期间，遭国民党消极抗战政策的出卖，上海成为沦陷区，四百万市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被蹂躏了八年。为了反抗侵略者的迫害，上海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抗战一旦胜利，他们要求和平民主的心情就更为迫切，真诚希望中国从此走上正道，真正好起来，以东方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是，随着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光复”上海的种种恶行，以及蒋介石决心内战、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独霸中国的企图，使上海人民的善良愿望成了泡影。

国民党集团到上海的“接收”首先给人民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巨大灾难。“接收”大员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抢票子、钱财、大发国难财。以四大家族为首的中国金融寡头，以统一货币为名，规定以二百兑一的比率，一律将伪币、中储卷兑换成法币。其结果是人民的膏血直接倾入四大家族和“接收”者的私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仅一月之内，生活指数上升五倍以上，人民生活骤然下降。同时，战后上海工厂停工，经济萧条。“接收”大员来后，非但不恢复生产，反而勾结美帝国主义，让其大量倾销剩余物资，摧残民族工业。至10月底，全市百分之九十工厂停工，另有一部分实行减工。受失业与半失业影响的劳苦市民达160万至200万之众，几占全市人口的一半。

国民党的“接收”还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的歧视和压迫。8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密令

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要他“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防止“市民滋肇事端”完全把人民当作敌人对待。相反，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却百般抚慰。国民党在上海为日本人设立“集中区”，在集中区的日本人受到异常周全优渥的保护，“昔日的掠夺者们满箱满笼、满捆满载的卡车一辆一辆往集中区搬去，八年间一切的抢劫掠夺霸占的行为竟然合法化了，事实化了。当上海人民衣食不周，饥寒交迫时，这些失败的‘公民’竟有鱼有肉，无忧又无愁”。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国民党的指使放纵下，这些侵略者居然“仍拿着武器，在吴淞和城外一带，大声喝叫地检查行人”，继续在国人头上作威作福。而国民党政府却要沦陷区人民发扬所谓“大国民风度”，不准对侵略者以牙还牙。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还无理地剥夺上海人民言论、新闻、出版等的基本自由权利。9月8日，国民党中宣部上海特派员宣布，今后上海的一切报章杂志，未经中央“核准”，一概不准发行。10月1日，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废除抗战时期在全国实行的“战时新闻检查法”，但又明令“收复区尚须暂缓执行此决定”，对上海报纸继续实行法西斯的“战时新闻检查法”。至12月，上海一些进步报纸被开天窗的事，仍屡屡发生。

随着“接收”大员到上海的，还有美国士兵的横行霸道、美式吉普的横冲直撞、美国军舰的耀武扬威、美国飞机的隆隆轰鸣以及各种美国商品的不断涌入。民族的尊严被践踏了，国家的主权被分割了。

所有这一切，使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上海人民，又一次蒙受巨大的屈辱和苦难，使他们重新陷入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

上海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

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的事实，昆明学生血的教训，“接收”大员的所作所为，使上海人民认识到，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是上海四百万同胞和全中国人民重新陷入苦难深渊的根本原因，也是陷国家于分裂、不得安宁的根本原因。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希望，为了自己的生存，人民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因此，一个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就在上海迅速展开了。工人发动工潮，学生举行罢课，各界群众纷纷集会，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随着运动发展的需要，代表人民正义呼声的进步报刊杂志如《周报》、《民主》、《文萃》、《昌言》及《文汇报》等冲破当局的封禁，先后创刊发行。文化界的进步民主人士通过这些刊物，大量发表文章，抨击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弊政和罪行，鼓吹民主和平，鼓励群众起来斗争。文化界民主人士的宣传鼓动，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斗争的实践使各界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认识到，为了更有力地向敌人进行斗争，有共同目标的志士仁人应该团结、联合起来，结成团体，依靠集体的力量与敌人展开斗争。于是各界群众纷纷发起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工商界成立了各行各业的工会，学生成立了“上海大中学生会联谊会”，教师组织了“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界组织了妇女联谊会，文化界成立了联合会。这些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充满了生机，成为当时上海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地诞生了。

第三节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

民进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不仅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为现实斗争所催生。

民进成立前的酝酿和筹备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基本队伍，主要由两部份民主力量组成。一部份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强烈的进步爱国民主思想。

早在抗战爆发前，他们就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呼吁团结御敌，一致抗日；抗战期间，他们留居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坚持不屈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目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意愿，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极为愤慨，于是又都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后改夷初。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人。早年参加柳亚子发起组织的南社。1911年夏在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家乡参与筹备民团响应起义。后任浙省都督府秘书。不久到上海，与章太炎合办《大共和日报》为总编辑。1913年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1915年为抗议袁世凯“称帝”逆行，毅然

辞职返浙。袁氏失败后 复应蔡元培之邀 再任北大教授。“五四”运动时，马叙伦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担任北大教职员会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和主席。北京大中小学教职员向军政府发起“索薪”运动，他被推为领袖。1921年6月3日，他带领万余教职员和学生游行要求面见徐世昌 遭反动军队毒打 头部受重伤。旋回杭州休养 出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长。北京政府改组后，他重返北京，两次担任教育部次长职务并一度代理部务。其间他曾机智地掩护过李大钊向志。1923年，任命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长。“三一八”惨案发生 他修书大骂段祺瑞而遭段通缉。马叙伦化装逃离北京回杭州，又鼓动浙江省长夏超响应北伐 反对南方军阀孙传芳 复遭孙的通缉。北伐军攻克浙江后，马叙伦出任省政务委员兼民政厅长。1928年冬 他再上北平任教育部次长，后又回北大任教。1935年华北事变后 他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倡议发起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被推为主席。他日夜奔忙，以致积劳成疾。1936年秋 受王昆仑托请 赴四川劝说刘湘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 他再次入川面劝刘湘避免内战。“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 马叙伦回到上海。为避敌伪迫害 他更名邹华孙（邹为其母家姓；“华孙”为中华民族之子孙）闭门谢客 专事著述。其时 他贫病交加 处境十分困窘。陈公博以学生名义（马在北大执教时陈听过他的课）派人送来钱粮，并希望马出山“帮忙”。马叙伦断然拒绝 将钱粮如数退回 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 他热望国家能从此一改旧观 走上正道。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大为失望。他从共产党和平民主团

结的建国方针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于是在花甲之年他又积极投身到勃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人民正义呼声的进步刊物的大量创刊发行是上海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周报》和《民主》两个刊物以其创刊早、发行量大、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而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众多进步杂志中创办最早的刊物。《民主》于同年10月13日出版，主编郑振铎。该刊实际由生活书店主办，书店经理徐伯昕给了该刊巨大的支持。马叙伦是这两个刊物的热心支持者和主要撰稿人。他是“支持《周报》最力的前辈”之一^①，又是《民主》的编委。在这两刊物的周围，还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他们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声疾呼并鼓动群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其中马叙伦尤为激奋，几乎每期都发表署名文章。这样，不期而然马叙伦就成了这些主要撰稿者的领头人。为了互通消息，及时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就经常相约聚会座谈。后来他们定期每两周在原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现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碰头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策略。这些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关系也相对固定，于是形成了一支有一定影响力的爱国民主力量队伍。

柯灵：《周报 沧桑录》，《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

与此同时 在王绍鏊周围 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王绍鏊(1888—1970)字却尘 江苏吴江县人。早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后即投身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他追随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并陪章到南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后来统一党被袁世凯收买利用,王毅然退出。不久,他参加国会的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但国会复遭袁氏强行操纵,王绍鏊愤然南归,参加了讨袁护法斗争。“五四”运动时,他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任教,热情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奔走呼号,发起组织“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1923年,曹锟演出逼选贿选丑剧,王绍鏊在北京联络江苏籍议员20余人拒选,遭曹通缉。王逃至天津,继续广泛联络各地方议员,鼓动各省区实行自治,反对军阀统治。1926年广东革命军北伐前夕,他受共产党人侯绍裘的影响,在家乡秘密组织“新苏公会”,策应北伐军,旋又联络浙江、安徽两省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结果遭军阀孙传芳通缉。1927年初,他到达革命重镇武汉。其时蒋介石真面目尚未暴露,名声颇著,王绍鏊因张群关系专程赴南昌面见蒋氏进言,结果大失所望。他对张群说:“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就立刻有较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的人!”并断言:“此人得志,中国将不可收拾。随即离鄂返沪。江苏同乡知他和蒋闹僵,颇有责备。但王坚持认为万万不能跟蒋共事,并说大家日后自会明白。果然,不久即发生“四一二”清

党案 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暴露无遗 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被彻底葬送。在严重困难面前 王绍鏊积极探索革命真理。他从内山书店买回大批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 带回天津家中潜心研读，从中感知中国必须进行彻底革命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而在当前“专制魔王蒋介石一天不倒 任何政治的改革绝没有办法。”于是他积极投身反蒋斗争 参加了 1930 年 4 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并成为核心一员。“九一八”事变后 他在上海邀集各方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旋又到北京和蓝公武等人发起救国协会 并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 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到处奔波 募集经费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军用。1933 年秋王绍鏊完成了从旧民主斗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折，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他先后去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1936 年 6 月 又受命赴山西策动阎锡山 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期间 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 坚贞不屈。“七七”事变后被营救出狱。之后他全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苏南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小组并参与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1940 年后 分别在香港、上海两地从事秘密工作 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他又全力投入反对蒋介石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与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都建有联系 在工商、文化界和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当时他身边有一大批抗战时期就志同道合的老朋友 赵朴初、张纪元、林汉达、梅达君、陈巳生、谢仁冰、冯少山、曹鸿嘉、朱绍文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座谈 议论时事，商讨反蒋斗争的策略，从而也形成了一股有一定影响和规模

的爱国民主力量。

共同的奋斗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队伍走到了一起。蒋介石继重庆谈判提出“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后又散布“先统一后民主”的口号迷惑群众。对此，王绍鏊作了一篇文章尖锐揭露说：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让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让蒋介石一人一统天下。他指出，现时的中国，只能先民主，使国共两党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这样自然水到渠成，统一也就是必然的事。文章在朋友中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建议将此文以意见书的形式去征求签名发表。文章传到马叙伦处，马老当即为其精辟的见解吸引，并通过谢仁冰邀约王绍鏊见面。两人会面一见如故，相谈甚畅。王绍鏊历数蒋介石论调的虚伪与欺骗，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字并提议请双方朋友一起座谈开会。双方首次聚会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马叙伦方面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燾、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地点也从广和居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他们不仅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他们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在以《民主》编者名义发表的《我们的主张和态度》一文中，他们大声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并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制止内战、压抑物价、惩处汉奸等五项政治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美国政府怂恿蒋介石内战的对华政策，1945年12月中旬，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郑振铎、林汉达、徐伯昕、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唐弢、柯

灵、傅雷、周煦良、李平心、郑效洵、谢仁冰、罗稷南、董秋斯、冯宾符、张纪元以及文化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共六十一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希望他们“给我们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克服目前的危急的难关。”这封信公开表明了这两部份民主力量的合作。

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王绍鏊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青年会开会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后来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在当时谈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因时说：

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经过以上酝酿筹备，中国民主促进会顺利诞生了。

成立大会和第二次会员大会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惟华、胡月城。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

这次大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议：一、一致决议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一致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明确规定了民进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简章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凡各界无党无派人士赞同本会宗旨，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理事会通过，得为本会会员”。简章规定民进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大会，同时设置理事会和常务理事，分别负责执行会员大会决议交办事项和本会经常事务；“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任罢免，常务理事由理事互推产生”；“一切本会之意志表示，概由会员大会决议”。简章规定了纪律：“会员如有破坏

本会名誉或违反本会宗旨之言论与行动者，经会员二人以上之提议，由会员大会通过，得取消其会员资格。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认识上的局限，简章还规定：“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这部简章表明，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的、政治组织。

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33人。许广平、傅雷、曹鸿翥、董秋斯、蒋天佐、朱绍文、张凤举等参加了第二次会员大会。大会进行了两项议程：一、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未参加大会）、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等十一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三人为候补理事；二、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是在王绍鏊所写《意见书》的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宣言》指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整个世界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重建中国、使中国成为真正有力的和平堡垒的“千载一时的机运”。但是，目前国家面临着内战独裁分裂与和平民主统一两种命运的抉择。如果“内部分裂造成不断的战乱”，中国必然仍“停顿在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境地，这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的；如果我们人民一致反对“战争的遗烬死灰复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走上我们应该走的政治道路”，中国就可以争取到光明的前途。《宣言》郑重提出：“人民一致的心理倾向，是不可抵御的巨浪，谁挡住它的路，谁便被它的浪花所卷没。对于中国民心的向背，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应该研究而